

# 我的美麗與哀愁： 在中國大陸的單身臺灣女性

林 平\*

---

\*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Email: polpl@ccu.edu.tw

收稿日期：2010.09.28；接受刊登：2010.12.29

## 中文摘要

當大部分移民研究著重在前往已開發國家的人群，預設並討論族群差異對移居生活的影響時，本文是以進入開發中國家的人群為對象，討論階層差異對移居生活的影響。根據筆者 2004-2005 年與 2008-2009 年對東莞與上海兩地單身臺灣女性的觀察，筆者發現雖然受訪者來自臺灣社會的不同階層，但是在當地都居於相對較高的社會地位。受訪者與當地人的階層差距，不是促成移居的主要動機，卻對定居的意願造成影響，特別展現在與當地男性的交留意願上。

對於受訪者而言，她們在當地社會的階層位置，主要取決於現居地（東莞或上海）與原居地（臺灣 / 臺北）在兩岸間的相對位階，以及臺灣人社群在中國大陸當地社會的位置。這樣相對優勢的階層位置，降低了受訪者與當地深入互動的意願，特別是與當地男性交往的意願。受訪者認為她們與當地男性的階層差距，不僅是經濟上消費能力的差距，更是文化上日常生活品味與感知氣息的差距，形成一種「不是不願融入，而是拒絕向下融入」的現象。

本研究從微觀的角度，討論階層位置對移居生活的影響，進而回答過去研究中「為什麼不願意融入」的問題。認為除了常討論的族群差異外，階層差異更可能影響移居生活，此一發現將有助於延伸既有的移民研究與臺商研究。

**關鍵字：**階層、移民、融入、單身臺灣女性、中國大陸男性

## 壹、前言

自 1987 年兩岸恢復民間交流起，一般推測已有 100 萬左右臺灣人長期居住在對岸，<sup>1</sup> 然而，這個華人社會之間的人口流動卻很少被既有的移民研究重視，因為大部分的移民研究集中在「族群」因素的討論，忽略了「階層」因素<sup>2</sup>可能造成的影響（Colic-Peisker 2008）。隨著產業遷移與全球人才競爭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前往其他國家，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Florida 2005; OECD 2008; Wennersten 2008），因此，討論白領階級的跨國移居經驗成為新的議題（Coles and Fechter 2008; Solimano 2008），也為本研究帶來指引方向。

在相關討論中，一個被忽視的現象是「優勢移民」（privileged migration）：從已開發國家往開發中國家的人口流動，或者說「北向南」的跨國流動。<sup>3</sup> 這類移居者也許在母國的知識技術有限，卻比地主國的一般大眾充裕，而在當地有更好的工作機會與社經地位，因此不願意與當地社會有深入互動（Fechter 2007; Walsh 2008; Willis and Yeoh 2008）。本研究的受訪者大多屬於此一類，他們所擁有的知識技術也許並不優渥，但是都比中國大陸一般大眾充足，藉由本文，我們對「優勢移民」的移居生活，特別是當中的單身女性，將有進一步的

- 
- 1 這是學界一般推估的數字。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到底有多少臺灣人在中國大陸，一直是相關研究的障礙之一。根據 2010 年 11 月剛結束的人口普查，在上海市經常居住（持多年期多次出入境的臺胞證）的臺灣人就超過 70 萬，因此，在全中國大陸有超過 100 萬的臺灣人，應是合理的推估。資料來源：中央社，<http://www.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 pNewsID=201012020201&pType0=aALL&pTypeSel=0>（取用日期：2010 年 12 月 20 日）。
  - 2 不論在中文或英文的研究中，「階層 / 階級」或「stratum/class」都經常混用。較早的用語，以「階級 / class」表示人群當中的上下區分關係，並強調彼此之間的衝突與對立，而「階層 / stratum」也是表示上下區分關係，但是較強調經由流動來改變上下關係；然而，晚近的用語似乎不再區分「階層 / 階級」與「stratum/class」。雖然混用的情況並不少見，筆者仍以「階層」一詞，來描述受訪者與當地社會的上下關係，而不採用「階級」，以避免延伸出的衝突意涵。
  - 3 本文所說「已開發 / 開發中」或「北 / 南」是特定時空下將「原居地」與「現居地」相互比較的結果，並非表示兩者之間的差距是固定不變的。

了解。<sup>4</sup>

兩岸間大部分相關主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產業遷移對兩岸政經關係造成的影響，從微觀層次討論移居經驗的研究較少。過去的研究發現，移居對岸的臺灣人大部分是臺資企業經理人、外派幹部與隨行家人，主要動機是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或避免在臺灣可能的失業風險（劉玉照 2005）；少部分是受到情感因素所驅使，例如：為了家庭團聚的外省老兵，或有強烈大中國意識的外省青壯世代等（林平 2009b, 2010）。雖然移居者動機各有不同，生活也有差異，卻大多無意把中國大陸當作是一個長久定居的地方（林平 2009a；鄧建邦 2009a, 2009b）。

然而，既有的研究並未討論為什麼這些人在當地呈現的是一種「有限度適應」的情況，不是有著安定感與幸福感的「安身立命」，而是在兩岸之間「持續不斷的回家」？這樣的發現不但與一般移民研究認為「若族群差異小，生活應該適應順利」（Gordon 1964; Borjas 1999; Portes and Rumbaut 2001）的預測不同，也與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中，認為移居者如果是在文化親近性較高之間的國家移動，會面臨較少的文化衝擊，應該能順利適應當地社會的預測不同（Berry 1992, 2004; Ward and Kennedy 1999; Ward 2004）。而近年來跨文化心理的發展，認為應該將移居者在新環境適應的研究，細緻到移居者的個人生活，以及將移居者與其他移居者或當地人的互動納入討論，形成一個包含（且跨越）個體與集體的 analysis，才能更瞭解所謂「適應」的真實全貌（Ward et al. 2001）。因此，筆者在本文當中，將「放大倍率」

---

4 根據筆者的觀察，新聞媒體與學術界當中對於此一「從臺灣到對岸」的人口流動現象，所使用的用詞並不一致，常見是以「移民/移居/移住/遷移」與「大陸/中國大陸/中國」來指稱。然而，不同的稱呼方式，隱含了使用者對於兩岸當前（或未來）是否從屬於某種形式的政治統合的認知差距。例如：「移民中國」意指這是一個「跨越國界的人口流動」，而「移居大陸」則認為這是「同一國家內的人口流動」。筆者無意在此討論這些差異，也無意因為文中使用不同詞彙而誤導讀者，所以在本文當中，筆者對「移民/移居/移住/遷移」與「大陸/中國大陸/中國」是以隨機方式任意使用，除非特別說明，不代表筆者與受訪者對於兩岸政治統合的立場。

檢視移居者的生活現況，瞭解他們「安身不立命」的原因，而不是將移居者口頭上所說的「我很適應」當作標準答案。深入觀察移居者的生活，以及移居者與其他移居者或當地人（特別是本文當中的當地男性）的互動方式，才能回答實證資料中的疑問，以及發掘既有移民研究當中的忽略。<sup>5</sup>

筆者透過紮根理論的資料處理方式來「讓資料說話」，發現這個「安身不立命」的圖像似乎隱藏著「階層差異」的原因，當中又以單身女性更為明顯。<sup>6</sup> 因此，本文是在不否認其他因素（例如：經濟誘因）的前提下，特別討論「階層差異」對移居經驗所造成的影響，並以單身女性為例，並不討論其他背景的受訪者（男性或已婚女性），雖然他們的經驗也是非常重要。

## 貳、文獻回顧： 移民研究中的階層與女性

雖然跨國人口流動的現象存在已久，但是研究者常將單一民族國家所形成的地理空間視為常態，把移居者如何能成為當地社會的一部

- 
- 5 感謝審查人的提問：移居者與當地社會維持有限度的接觸與隔離，算不算是一種「適應」？筆者認為需要進一步檢視這種「有限度適應」的現象，除了是對既有理論的回應外，也是田野中「恍然大悟」的經驗。筆者在田野調查的過程當中，不止一次有受訪者愉快地談論著自己在當地的生活，表示「我很適應」，並且建議筆者「不要唸博士了，留在這邊比較實在」。開始，筆者也像一般旁人一樣，以為受訪者口中的「我很適應」就是真實生活的全貌，但是，偶然一次無心的回問「那你會一直都留在這邊囉？」卻讓受訪者陷入沈靜與尷尬，才讓筆者意識到受訪者口頭上的「我很適應」可能只是某些物質生活的滿足，或者是用來應付外界探詢的「標準答案」，與內心真實感受有相當的距離。這種表層與深層的差異，被一般的移民研究所忽略，因此，有必要採用類似跨文化心理學的方式，深入討論移居者的內心轉變。
- 6 某位審查人提問，筆者似乎是先發現了「安身不立命」的現象，再去尋找原因？的確，筆者是先發現了這個現象，再解釋為什麼會發生。在寫作的過程中，也有學術界前輩提出，是不是有其他因素（例如：兩岸政治差異或族群差異）更適合解釋？然而，從筆者收集到的資料，以及這些年來持續與不同性別受訪者的互動聯繫，更傾向選擇一個「受訪者也同意」的切入點，也就是以「階層差異」來解釋這個現象發生的原因，並以單身女性的生活來說明。因此，本文討論單身女性，卻少觸及常見的「性別 / 空間」論點，實在是在不同主軸及篇幅有限下不得已的選擇。

份，作為研究的出發點（Wimmer and Schiller 2002）。如果移入人群並未被吸納進當地社會時，移居者與當地人的「族群」差異，或「文化」差異，常被認為是適應困難的原因（Harzig and Hoerder 2009），並認為移居現象若發生在「族群」差異小，或者「文化」差異小之間的人群時（Gordon 1964; Borjas 1999; Ward and Kennedy 1999; Berry 2004），移居者應該能順利適應當地社會。然而，這種強調「族群」或「文化」差異的解釋經常忽略了其他因素（Colic-Peisker 2008）。本文討論的是華人社會間的人口流動，當「族群 / 文化」的差異被降低時，正有助於思考其他因素。

## 一、移民與階層：移居者不一定是社會底層人

隨著科技發展與跨國企業增加，跨國人口流動的類別也越來越多，他們不一定是低技術的勞工，而可能是中產階級或專業知識的技術人員（Castles and Miller 2003; Florida 2005），方向也不一定是由開發中國家往已開發國家的「南向北」移動。因此，傳統「南向北」移民研究的成果，不見得能解釋新的移居現象。例如，在「北向南」流動中，移居者可能在當地國佔據中高階位置，而有不同的移居經驗（Thang et al. 2002; Favell et al. 2006; Coles and Fechter 2008）。

根據 Fechter（2007）針對「印尼的西方人」的研究與 Leonard（2010）的歷史資料整理，這些「北向南」的「優勢移民」呈現的是一種「拒絕融入當地社會」的現象，與過去「南向北」的「勞工移民」呈現的「被當地社會排斥」的現象不同，但是與過去「旅居殖民地的母國人民」研究相似（Cartrell 1984; Kirkwood 1984）。這些研究中，移居者偶然前往較落後國家，發現自己有限的資源與能力在母國不受重視，卻在新環境中有競爭優勢，因而從短期停留延伸為長期居留或定居（Fechter 2007）。

Fechter（2007）關於「階層與移居生活」的討論，在 Colic-Peisker（2008）的研究中更清楚的顯現。Colic-Peisker 發現，即使是

從同一母國進入同一地主國，移居者在移入初期時階層位置的差異，將使他們的移居經驗有所不同，因此，他將移居者的階層位置定義為：移居者母國與地主國在國際上的相對位階（global hierarchy of nations），以及移居者在當地社會所屬團體的社經地位（the socioeconomic profile of the group itself）。雖然這些研究都指出，不同的階層位置會帶來不同的移居經驗，但是國際上的相關研究並不多（劉云剛等 2010）。

這種對「階層」因素的忽略，也出現在臺灣的移民研究上。雖然社會學者藍佩嘉（2005）與曾嫻芬（2006）都指出，臺灣的移工 / 移民政策，一方面將來自西方與日本的外籍人士都視為高階白領，是受歡迎的移入者，另一方面又將來自東南亞的外籍人士都視為落後的他者，排斥在國門之外。但是目前只有極少數的研究以這些「高階白領」為對象，討論他們在臺灣的生活（小宮有紀子 2008; Tzeng 2010）。在移出人口方面，如果區分為進入歐美先進國家的「華僑 / 臺僑研究」與前往後進國家的「臺商研究」，學者們都認為海外僑民與當地社會互動有限，需要經過相當長時間才會改變（Siu 2005; Park 2008; 王宏仁 2009; 姜蘭虹、黃禮強 2009）。然而，學者們似乎忽略同樣是「互動非常有限」的表層現象，是否有不同的原因？同樣的，雖然既有「中國大陸臺商研究」認為，移居到東莞的臺商多屬於中小企業或勞工創業，移居到上海的臺商多屬於教育水準較高或與資訊業結合，前者在當地有相當的優勢，後者與當地的差距較小（耿曙 2002），但是也缺乏進一步討論這樣的階層差距，會對移居經驗帶來什麼影響。<sup>7</sup>

7 比較特殊的是夏曉鵬（2002）在《流離尋岸》當中，討論國際政經體系（核心國 / 半邊陲 / 邊陲）對跨國婚姻的影響。此外，龔宜君（2005）在《出路》一書中也描述了在東南亞的臺資企業當中，臺灣人、當地華人與當地人的上下階層關係，但是比較缺乏討論此一階層關係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另一個例子是耿曙與林瑞華（2009）的會議論文〈階級、省籍或政黨？臺灣人當地融入狀況之比較〉，僅有點出階層位置可能造成影響，缺乏深入討論。



無論是早期的殖民地研究，或是晚期 Fechter (2007) 與 Tzeng (2010) 的研究，都顯示對於進入後進國家的移居者而言，移居者在地主國的階層優勢會使他們的移居經驗格外特別。然而，這些討論的既是跨階層也是跨族群的人口流動，當本研究將「族群」的因素降低後，更可瞭解「階層」因素帶來的影響。

## 二、階層與女性：從「雙重壓迫」到「鳥籠裡的金絲雀」

既有的移民研究大多以男性的移居經驗為主，較少討論女性移居者的經驗 (George 2005)。以女性為主題的討論，主要集中於女性如何在移居過程中挑戰父權社會限制，重新定位自己 (Kofman et al. 2000; George 2005; Chiang 2008)。這些研究中的女性，大多是求生存存活的「南向北」移居者 (Piper and Roces 2003)，她們面臨地主國與本國男性的「雙重壓迫」，因此容易接受不符合自己專長，又不被重視的工作機會 (Dias and Wanasundera 2002; Garcia et al. 2002)。

以「優勢移民」女性為主題的研究就更少了，有限的研究都是以跟隨配偶而前往後進國家的女性為主題，發現他們比當地人享有更好的物質生活，但是專業能力不被當地的母國社群認可，也不被允許與當地社會有較深入的接觸 (Clark 1984; Tremayne 1984; Callaway 1987; Strobel 1991)。雖然這種移居經驗滿足了移居者想要成為「全球菁英」(cosmopolitan elite) 的想像，但實際上是「金鳥籠裡的麻雀」(living in the golden cage)，與外在世界有著不小的隔閡 (Fechter 2007)。

若是與傳統為了求生存而遷移的女性相比，這些女性比較是為了「家人團聚」或「追求自我實現」而移居 (Fechter 2007)。她們遷移後發現，自己所屬的移民社群排斥當地社會，而另組不對當地人開放的小團體 (Coles and Fechter 2008)。她們移居前都有一定的工作基礎，雖然移居後不需要投入於家務勞動，卻必須放棄自己專業領域的成就來配合配偶，還可能被貼上「累贅」(trailing spouse) 的標籤



(Yeoh and Khoo 1998)。

然而，這些有限的研究，多集中在已婚女性，缺乏對未婚女性的討論。兩項以單身女性為主題的研究（在中國的英國人 / 在新加坡的日本人）發現，她們與被視為「累贅」的已婚女性不同，有著自己的工作與成就感，對生活品質與情感歸屬也有一定程度的渴望（Thang et al. 2002; Willis and Yeoh 2008）。雖然如此，她們卻又對當地男性多抱持著一定的距離，希望與同國籍的男性交往，相當程度因為無法在當地獲得滿意的情感關係而離開（Willis and Yeoh 2008）。然而，這些研究缺乏進一步討論，為什麼她們排斥當地男性？可預期的婚姻（或穩定的異性關係）對她們的移居生活有多大的影響？

### 三、階層與婚姻：婚姻是品味相近的結合<sup>8</sup>

討論階層，就必須先談論「階級」（class）。根據 Marx（[1857] 1993）的定義，階級是依生產方式區分成「擁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與「出賣勞力換取工資的工人」。他以生產關係為來界定階級，並且認為此一對立關係必須經由革命才能解決。然而，這樣的分析有其獨特的時空環境，當進入二十世紀後，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昇，加上第三產業蓬勃發展，這種「二元對立」的上下位置關係相當受到挑戰。Weber（[1848] 2005）認為上下位置關係的界定方式，除了經濟面向的財富之外，也包含社會面向的聲望與政治面向的權力，並且認為不同的上下位置會帶來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消費模式。此後，不少學者延續 Weber 的看法，以多元流動的位置關係取代 Marx 的二元對立，並逐漸以「階層」（stratum）取代「階級」（class），但不時也有混用的情形（楊國斌 2009）。

Weber 之後，Veblen（[1899] 1994）與 Bourdieu（1984）等人也

---

8 要特別說明的是，筆者無意認為婚姻是每個人的必經路徑。但是由受訪者的反應顯示，「是否（可能）有適當的婚配關係？」是影響在她們在當地生活的關鍵因素，因此加入這一小結的文獻回顧。

討論階層位置對生活方式的影響。Veblen 在《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書中指出，對於經常從事體力勞動的下層階層，由於收入不穩定，消費行為是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做為優先考慮，當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滿足後，才會從事其他消費行為。但是，對於有錢有閒的上層階層而言，為了區別自己與體力勞動的下層階層，休閒不是只為了維持繼續工作的能力，還刻意強調精神層次的活動；消費不再是只是為了滿足生活需求，還必須刻意維持特定的美感或舒適的生活環境。

Bourdieu 在《秀異》（*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一書中進一步提出了「社會空間」的概念，來描述階層與生活方式的關係。他認為行為者的資本總量與資本結構（文化資本 / 經濟資本），決定了行為者在這個社會空間當中所處的位置。而在這個社會空間當中，位置越接近的行為者，彼此之間在客觀條件上有著越多的共通性，有著類似的行為與偏好。這些行為者，又可以分成有充裕資本的宰制階層、依循既有社會秩序往上爬的小資階層，以及底端的無產階層。而社會當中的主流文化與秩序，是依照宰制階層的觀點進行。宰制階層的儀態、語言、生活與消費方式，常被定義為「好的品味」，成為社會風尚。

在這個社會空間中，「階層」與「生活方式」彼此之間不但有著相當的關連性，還會內化成為某種具有意義的感知與氣質而成為「慣習」（*habitus*），形成對文化藝術偏好的品味，並且在不同的場域中有著不同的實踐。在這個階層 / 慣習 / 品味 / 實踐的關係中，中下階層的行為者會透過學習中上階層的生活實踐，希望逐漸改變自己的品味並形成慣習，以提升自己的階層地位。另一方面，也由於行為者在不同場域中的實踐，反映出他的品味、慣習與所屬的階層，行為者也容易透過他者在生活當中的實踐，來判斷對方的品味與感知氣息，進而判斷對方在社會空間中的位置，來決定彼此互動的親疏遠近關係。行為者還會採取若干策略，來維持或增加資本總量，以維持或提升社會

地位。例如：小資階層除了會刻意模仿宰制階層的品味與實踐外，還可能會刻意與宰制階層建立密切的社會關係，或排斥與中下階層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進而提升（或避免降低）自己的社會地位（Bourdieu 1984）。

在各種策略中，婚姻關係是重要的環節之一。Becker（1973, 1974）的研究發現，人們選擇婚配對象，是在一連串內在與外在因素的綜合比較下，選出外在因素價值總和最大，但是內在因素差異最小者，成為婚配對象。外在因素主要是指以職業、收入及教育為主的物理特質；內在因素主要是指人格特質、偏好與品味為主的心理特質。也就是說，婚配對象是受到階層位置所影響，而這個階層位置，包含了經濟面向的收入與工作，與文化面向的偏好與品味（Tu 2007）。

Bourdieu與Becker的推論，也受到實證研究的支持。華人社會的研究更進一步發現，女性容易將婚姻視為向上流動的機制，因而偏好選擇位置高（或排斥位置較低）的男性，形成一種「上嫁／下娶」的現象（Croll 1981; Tu 2007）；臺灣的研究也支持了Becker的看法，認為女性擇偶偏向選擇外在因素價值總和最大，但是內在因素差異最小者，形成具有「同質婚」（homogamy）性質的「上嫁／下娶」（marriage gradient）關係（伊慶春、熊瑞梅 1994；蔡淑玲 1994；楊靜利等 2006）。而在跨國婚姻方面，既有的研究也顯示，跨國婚姻容易集中在先進國家男性與後進國家女性之間，形成一種跨國版的「上嫁／下娶」關係（Lu and Yang 2008; Tseng 2010）。<sup>9</sup>

9 編輯委員提出一個問題，「上嫁／下娶」是否完全由當事人雙方所屬的族群／階層背景而決定？例如：臺灣中產階層女性與美國農村男性的婚姻，是「上嫁」還是「下嫁」？筆者的回應如下：第一、這一小段的文獻回顧，多是從既有統計資料得來的鉅觀分析，所呈現的趨勢，可以作為本文討論的基礎，但是不表示適用於每個受訪者；第二、筆者也同意這樣的相對位階關係，是有可能受到時空環境變化及當事人個別情況而有所影響。本文中對S-11、S-13、D-3與Doris的討論，以及其他受訪者對這幾位當事人的看法，都呈現出這種變動的可能。

#### 四、小結與提問

綜合以上的討論，可以得到幾項結論與提問。

(一) 當主流的移民研究與跨文化心理學研究，認為「族群 / 文化差異」是解釋「移居者是否適應」的主因時，當前的臺商研究卻發現，雖然兩岸之間有著語言文化的高度親近性，移居者並未如預期產生「安身立命」的定居現象。這顯示應有其他的原因，影響了移居者的生活適應。

(二) 由於本文受訪者比當地社會一般人有著更高的社經地位，引導我們回顧從 Fechter (2007)、Colic-Peisker (2008) 到 Leonard (2010) 有關「優勢移民」的研究，進行一個較少被討論的問題：當移居者不是缺乏知識技術的低階勞工，而是比當地一般人有著更充裕的專業知識，他們是如何融入當地社會？既有研究顯示，這些移居者在當地社會是一種「拒絕融入」的現象，而不是「被排斥」的隔離，然而，這些研究多以男性或已婚女性為基礎，很少針對單身女性的討論。藉由討論單身女性的生活，特別是她們對當地男性的看法，來說明為什麼是一種「拒絕融入」的現象。

(三) 由於討論本文受訪者對當地男性的看法，涉及到不同階層之間如何互動的問題，我們回顧 Marx ([1857] 1993)、Weber ([1948] 2005) 與 Bourdieu (1984) 以來的研究。這些研究顯示階層代表的是資本總量與資本結構的差異。這兩者的差異決定了行為者在社會空間中的位置。這些位置不但影響了行為者內在的感知氣息，以及外在的品味與生活實踐，更影響了不同行為者之間的親疏遠近關係。Bourdieu 進一步認為，行為者也會採取若干策略，例如：婚姻，來建構（或避免）特定社會關係，以維持並提升（或避免下降）自己的位置。這樣的看法間接被既有（跨國）婚姻研究所支持，但是女性更容易採取此策略，因此容易呈現出「上嫁 / 下娶」的通婚現象。

(四) 基於這些文獻回顧，筆者提出兩項假設。第一，造成受訪

者不願意在當地定居的原因，並不是過去移民研究假設的族群差異，而是移居者與當地社會的階層差異。她們對當地一般男性的排斥態度，以及對高階白領男性的想像，呈現的正是 Bourdieu 的社會空間當中，小資階層希望透過不同策略，以提升（或避免降低）社會地位的方法。第二，根據 Colic-Peiske 的定義，移居者的位階是由原居地與現居地在國際上的相對位階，加上移居者社群在當地社會的位階而決定。由於兩岸城市之間的發展在近十年有了相當大的變化，使得臺灣（臺北）/上海/東莞在不同的時間點，有了不同的階層差距。因此，筆者假設東莞 / 上海兩地同一時期的同類受訪者，或者同一城市在不同時期的同類受訪者，她們對當地男性的態度也是有所差異的。而這些差異，更說明了階層差距所造成的影響。

## 參、研究方法

由於統計抽樣的困難，過去相關主題的研究都是以滾雪球的方式，在特定臺商企業中選取受訪者（林平 2009a）。本研究不希望呈現的是特定企業內受訪者的反應，而是不同受訪者之間共同反應，以及反應背後共同因素。因此，筆者以最大差異化的抽樣方式，盡可能窮盡不同背景的受訪者，藉著訪談與參與觀察的方式，來瞭解她們移居中國的原因與移居後的生活。

### 一、資料來源

雖然至今沒有明確的統計數據可以說明臺灣人在中國大陸的分佈狀況（林平 2009a），但在 2004 年前的研究就已經顯示，東莞（以及鄰近的廣州與深圳）及上海（以及鄰近的江蘇昆山）是當時的主要聚集地，並且設有兩岸政府都核准的台商學校（牟淑芬 2001；林至真 2002；劉勝冀 2002；莊好、魏炯翔 2003），因此，筆者在 2004-2005

年時選取這兩地為主要田野調查地。<sup>10</sup>2004-2005年時，筆者在東莞與上海兩地一共接觸 51 位受訪者，其中 22 位是女性。在這 22 位女性當中，有 8 位離開臺灣時就已經結婚，有 14 位離開臺灣時未婚（當中又有 4 位後來結婚）。此外，筆者也積極參加相關單位的活動並收集資料，以補充（或確認）受訪者的資訊。<sup>11</sup>本文是以這 14 位受訪者在 2004-2005 年及 2008-2009 年的移居生活為主，同時參照其他資料，來探討單身女性的移居經驗。這些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如下。

表 1 14 位主要受訪者基本資料（2004-2005 年）

	代號 / 族群 <sup>12</sup>	性別 / 出生年 <sup>13</sup>	教育 <sup>14</sup>	工作經驗 <sup>15</sup> 臺灣 / 大陸	住宅 <sup>16</sup>	親人 <sup>17</sup> 臺灣 / 大陸	職業 <sup>18</sup>
東莞地區	D-3 / 外	女 / 67	16	10 / 3	是	是 / 否	外派
	D-6 / 外	女 / 77	16	0 / 2	否	否 / 否	外派
	D-10 / 外	女 / 81	16	0 / 1	否	是 / 否	外派
	D-12 / 客	女 / 83	14	0 / 2	否	是 / 是	外派
	D-19 / 客	女 / 85	13	0 / 0	否	是 / 否	學生
	D-20 / 客	女 / 77	16	5 / 0	否	是 / 否	學生
	D-25 / 閩	女 / 77	13	1 / 7	否	是 / 否	外派
	D-30 / 閩	女 / 81	16	0 / 1	否	是 / 否	外派
上海地區	S-2 / 外	女 / 57	14	10 / 10	否	否 / 是	外派
	S-4 / 閩 <sup>19</sup>	女 / 69	18	5 / 4	是	是 / 否	自營
	S-7 / 閩	女 / 69	16	1 / 11	是	是 / 否	無業
	S-11 / 閩	女 / 67	17	8 / 1	否	否 / 是	外派
	S-12 / 閩	女 / 58	16	20 / 6	是	是 / 否	自營
	S-13 / 外	女 / 63	16	5 / 12	是	是 / 是	自營

10 有兩點要特別說明。第一、當初選取這兩個城市，不是為了進行比較研究，而是試圖在有限的時間與經費限制下，儘量包含不同地區的臺灣人，拼湊出一個全貌。然而，也許本文讓讀者有「雙城比較」的味道，純粹是資料呈現的自然結果，並非一開始就刻意進行比較。第二、雖然隨著時代變遷，臺商也逐漸往內陸城市移動，但是各種研究報告依然顯示，這兩個城市仍然是臺灣人最大的聚集地。因此，以這兩個城市為主要田野地，有一定的合理性。

11 這些單位包括：東莞、上海與昆山三地的臺商協會與臺灣事務辦公室、華東臺商學校、東莞臺商學校、東莞臺胞臺屬聯誼會、上海慈濟，以及臺北市東莞同鄉會等。

## 二、分析與限制

參考前一節文獻回顧中 Colic-Peisker (2008) 的討論，在本研究中，將受訪者的階層位置定義成：「原居地（臺北）與現居地（東莞或上海）的相對位階，加上移居者在現居地（東莞或上海）所屬團體的位階」，<sup>20</sup>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瞭解這樣的階層位置對於移居生活的影響？如同前一節文獻回顧中「四、小結與提問」的假設，除了直接與受訪者討論之外，透過比較同一時間的同類受訪者在不同城市的生活，或是比較同一受訪者在不同時間對同一議題的反應，可以知道階層位置的差距對受訪者移居經驗的影響。

在資料分析上，筆者是從田野紀錄中選取內部關鍵事件（例如：2004-2005 年某臺資企業的「門禁事件」）、外部重大事件（例如：2008 年北京奧運、臺灣總統大選，以及 2010 年上海世博與廣州亞運），以及一般生活事件（例如：週末休閒活動、八卦傳聞）為主要資料。將每一個事件視為一個「小拼圖」，再以「鳥瞰」的方式將「小拼圖」拼湊成立體的「大全貌」，來呈現出不同受訪者之間的共通點。此一方式雖然看似不如常見的「訪談與回答」直接，但資料是

- 
- 12 代號 / 族群：本文當中所使用的代號；「閩」代表閩南、「客」代表客家、「外」代表外省。
- 13 性別 / 出生年：男表示男性、女表示女性；數字表示出生於西元 19XX 年。
- 14 教育：表示受過多少年的學校教育。
- 15 工作經驗：表示在臺灣與大陸兩地分別有多少年的工作經驗。
- 16 住宅：表示是否在大陸擁有私人住宅。
- 17 親人：表示移居之前，是否有「臺灣人」或「大陸人」的親人在大陸。
- 18 職業：「自營」表示為企業業主、「外派」表示臺資企業派駐大陸幹部、「當地」表示受雇於大陸當地企業、「外商」表示為外資企業派駐大陸幹部。
- 19 加框的這 4 位，S-4, S-7, S-11, S-13，雖然離開臺灣時未婚，但是後來都在大陸當地結婚。
- 20 也許讀者會問，為什麼現居地要區分成東莞與上海，而原居地卻是以臺北為對象？第一、雖然本研究中受訪者都在中國大陸，但是分屬在東莞與上海兩個在教育水平、人均收入與基礎建設差異大的城市，所以前述「地主國」的定義修改成「現居地（東莞或上海）」，以符合討論需要。第二、雖然受訪者來自臺灣不同城市，但是發現受訪者在移居之前，都在臺北有過相當長時間就學或工作，對受訪者而言，臺灣內部的城市差異雖然存在，但不被認為有影響力的比較基礎。因此，筆者以「臺北 / 東莞 / 上海」在兩岸之間的比較，取代「母國 / 地主國」的相對比較。



來自受訪者真實生活的觀察，更能反映出受訪者的真實意向。

此外，雖然筆者採取「最大差異化」的抽樣方式，根據不同背景受訪者的共同反應，來推測這是母群體（在東莞與上海兩地的單身臺灣女性）「應有的重要現象之一」，但是筆者無意表示可以推測成母群體「所有重要現象」，也無意否認還有其他重要因素的可能。因此，本文當中與受訪者有關的數字部分，純粹是當時情境描述，除非特別說明，並不具備強度或頻率上的意涵。

## 肆、發現與討論

雖然本文主題是集中在遷移後的生活，但是為了讓讀者有較完整的瞭解，也由於階層對遷移動機具有某些影響，因此，仍然先討論她們的動機。

### 一、「位階上升」的想像：移居前的共同期望

在 14 位受訪者當中，12 位在筆者初次接觸（2004-2005 年）時就表示「經濟因素」是自己到中國大陸的主要原因。<sup>21</sup> 他們認為到大陸工作，是為了避免在臺灣可能的失業風險，但隨著接觸時間越長，筆者發現這個「言之有理」的說法可能還有許多「一時說不清」的原因，像是「跟他分開（分手 / 離婚）後，我就來到這裡了」，<sup>22</sup> 或是「她是董事長 / 會長 / 總經理的親戚，（所以她有這份工作）」。<sup>23</sup> 很快的，「經濟因素」並不能充分解釋她們的遷移動機，對她們而言，移居不僅是「找 / 換工作」，更是特定情境下掌握機會，滿足「升級」的期望。

21 例外的這二位受訪者，一位是早在 1990 年代初期就跟隨父親返鄉的外省第二代，另一位是為了與在英國認識，後來相戀卻分開兩地的大陸男友結婚定居。

22 感謝審查人的提醒。的確，「逃離臺灣的婚姻 / 感情壓力」也是較資深受訪者離開臺灣的因素之一，在本文較早的版本——短文〈庭院深深幾許〉（林平 2009c）中曾有所討論，然而，此一因素並不適用於較年輕的受訪者。為了避免模糊焦點，所以本文並未針對這一部份討論。

### （一）「換個地方開花店」：8 位較資深的受訪者

先討論 14 位當中，8 位在離開臺灣時已經超過 30 歲的受訪者，雖然教育程度各異，但是移居前都有了相當穩定的工作，與當地人（或當地的臺灣人）並無密切關係。為何在臺灣工作穩定，大陸又沒有熟識親友的情況下，卻放棄臺灣的生活呢？面對這個疑問，有 6 位受訪者回答「（我朋友）要我來跟他來這邊試試看，我就過來了」，表示移居大陸是為了想要試試看不同的工作環境。<sup>23</sup>

她們為什麼會有信心選擇以中國當作新的方向呢？除了「語言通」的共同反應外，她們都感慨自己在臺灣的工作雖然小有基礎，但是不受到重視，透過當時的資訊，發現自己的專業所學在當地「應該是很有發展的，因為這邊人不懂」，而有勇氣的決定移居。例如：從南部某國立知名大學企管畢業後，便經營個人花店的受訪者 S-7，她表示雖然生意穩定，但是「開花店」的工作始終不被親友認可。偶然中聽到在大陸工作的朋友抱怨「去醫院看病人，居然找不到地方買一束像樣的花」，她發現即使是號稱「十里洋場」的上海，很多方面仍然是落後臺灣，她認為自己在臺灣不受重視的經驗，到上海應該會有發展空間，而選擇移居。

### （二）「小職員變機要秘書」：6 位較年輕的受訪者

接著討論 6 位在離開臺灣時是單身，年紀都是 20 餘歲的受訪者。雖然她們在臺灣至少都接受 12 年以上的教育，但是工作經驗有限，卻有 4 位是在當地台商企業擔任機要秘書或會計工作。<sup>24</sup> 面對筆者「為

23 例外的這兩位都是外省第二代的受訪者，對她們而言，雖然同樣有著「尋找新的事業/感情的空間」的因素，但是臺灣政治的紛擾不休與令她們感受沈重的「去中國化」發展，才是促成她們離開臺灣的關鍵因素。關於外省第二代受訪者的討論，請參閱另一文〈身在家鄉為異客〉（林平，2010）的討論。

24 例外的這兩位是 D-10 與 D-19。D-10 在原錄取人臨時缺席的情況下，被臨時通知遞補上班。D-19 則是在當地高校就讀的大學生，雖然她不在當地工作，但是在「臺灣只能進入後段大學」的情形下，如願進入了當地知名高校就讀。

何到大陸工作？」的詢問，得到都是如「在臺灣找不到（適當的）工作啊」這類答案。當筆者進一步詢問，如何在缺乏相關學經歷時，卻能成為當地臺商企業的核心幕僚，得到了「運氣好」這類回應。然而，隨著接觸時間延長，筆者發現她們都是在家庭近親的協助下，得到在大陸的第一份工作，或是第一份工作的實際雇主，就是近親長輩。

雖然「找不到（適當的）工作」是受訪者思考離開臺灣的主因，卻不是成行的關鍵因素。她們表示自己與若干家人都曾以「安全問題」為理由遲疑，但是，另一些家庭成員表示，移居後不但可以有工作，更能從無人聞問的小職員「升級」成為公司的核心幕僚，並且住宿交通等基本生活都有人照料，因而「放心」移居當地。當受訪者發現無法在臺灣的就業市場取得一定的競爭位置時，透過近親的安排，發現自己有限的力量在大陸可以得到超過預期的工作機會，這種「爽爆了」的想像，相當程度使受訪者輕忽其他風險而決定移居。

### （三）代小結：遷移不只是為了工作，更是對於向上流動的期望

這一節的討論發現，受訪者所宣稱的「經濟因素」與過去「南向北」研究主張的「經濟因素」有所不同，並不是一種「非走不可」的情況。在這個「找 / 換工作」的表層現象下，隱含的是對「升級」的期望。受訪者覺得自己將由「有點小基礎，但又好像施展不開的幹部 / 小老闆」轉變成「開創另一片天空的專業經理人」，或由「累得要死，還被人當作是垃圾」的小職員轉變成「董事長 / 總經理的機要秘書」。也就是說，雖然受訪者在臺灣的背景不同，但是共同點是都預測自己移居後會取得更高的社經地位，而願意去面對新的環境。

對於第一組「換個地方開花店」的受訪者，雖然自己在臺灣的工作穩定，但是也面臨一定的瓶頸，試圖藉由到東莞 / 上海從事相關行業，以尋找另一片天空；對第二組「小職員變機要秘書」的受訪者而言，雖然「找不到（適當的）工作」是離開的主因，但是從「安全問

題」到「放心」的轉變，顯現出「升級」期望所帶來的影響。這兩組受訪者的考慮，在不同方向上符合了過去的階層研究，認為「階層流動的期望」在相當程度上會引導個人的行為與目標（Erickson and Goldthorpe 1993）。對於這群具備若干資源的移居者而言，遷移不僅是「移出」，工作也不僅是「為了生活」，更是追求更好的「階層位置」。雖然新國家看似落後，卻可以取得相對優勢的位置，從母國社會的一個小市民轉換成地主國社會的重要人物。然而，由於這種「向上流動」的期望是建立在與當地人的對比上，這種「高人一等」的預期心理，反而限制了移居後的定居意願。

## 二、「不是不願融入，而是拒絕向下融入」：

### 移居後的生活適應

她們移居後的生活又如何呢？筆者發現，當受訪者一方面高興的談論上海外灘美景與羅湖商場購物經驗時，另一方面卻對筆者「生活這麼好，那你應該會長久待下來囉？」的問題沈默，筆者的疑問是，上海外灘的五光十色與久光百貨的精品專櫃（或者東莞上島咖啡與虎門盜版 DVD），真的可以滿足受訪者嗎？

如同〈從居住空間看臺灣人對中國大陸當地的認同〉一文中的描述，在 2004-2005 年時，在東莞與上海兩地有工作的受訪者，若非企業經營者，就是任職於臺資企業的中高階幹部。而當地臺資企業對於臺籍員工都會提供比當地員工優厚的食宿與交通安排，形成一種「同公司上班，同住在宿舍，卻各過各的」情況，即使自行在外租屋或購屋，與鄰里的互動也非常有限（林平 2009a）。形成不僅是「地理空間」上的區隔，更是如同 Bourdieu（1984）所說，是「社會空間」上的區隔，是一種同時結合了經濟能力、消費行為與生活品味上的區隔，才會有「我們去文華酒店吃飯，一餐六十八；她們去旁邊的路邊攤，一餐十塊錢」的現象。

筆者無意評斷這些生活方式，但是想指出這種生活方式，是另外

一種形式的區隔。雖然如同移居前的想像，移居後「小職員變機要秘書」、「小老闆變經理」，真的是「有房〔宿舍〕、有車〔交通車〕、有佣人〔鐘點工〕」但卻是一種「鳥籠裡的金絲雀」（living in a golden cage），進一步限制了她們與外在世界的互動（Fechter 2007）。這種因為「優勢階層」而造成的隔閡與影響，更可以由她們對當地男性的態度來說明。

### （一）「庭院深深深幾許」：8 位較資深的受訪者

對於前述「換個地方開花店」的 8 位受訪者而言，她們都以「看看再說」的答案，表示自己的定居意願。這個回應乍聽之下都是指「工作上是否穩定」來決定，但深入瞭解後發現，相當程度上是受到「感情是否穩定」的影響。

如同〈從居住空間看臺灣人對中國大陸當地的認同〉一文中的描述，受訪者假日也會到市區或鄰近城市逛街購物。當臺籍男性希望能有適當的女性伴侶，受訪者也會希望在當地有適當的男性伴侶。但是，令她們失望的是，當臺籍男性的夜晚若不是忙於加班工作中，或是有著可以一起「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女性伴侶，就是享樂於當地的聲色場所。她們發現自己一方面不被鼓勵如同男性一樣縱情於聲色場所，另一方面卻在尋找伴侶的過程中產生焦慮，進而不確定是否真的要在當地定居？<sup>25</sup>（林平，2009a）

25 受訪者因為缺乏適合的婚配對象而產生的焦慮，不太容易在訪談中表達，但是在 2004-2005 年，有一個「門禁事件」與相關延伸傳聞，也許可以協助讀者瞭解。當時有一臺資企業某日突然將臺籍員工分男女集中召開臨時會議。在對男性員工的會議當中，男性最高負責人表示，最近有一位男性幹部因為在花街柳巷尋芳而遭到當地公安拘禁，他提醒男性員工「要自愛，要想到家庭」，並且要求男性員工抄下他的電話號碼，如果有發生任何「緊急情況」，要立刻電話聯絡他。男性員工在會議結束後一方面揣測「是誰出事」，另一方面彼此調侃「最近要乖一點」，把會議當作善意的提醒。但是，在對女性的員工的會議當中，女性最高負責人僅表示「大家都是好姊妹」，要求大家互相提醒，並且每晚「十一點之前要回到宿舍」，並沒有進一步解釋這項「門禁」的原因。當男性員工將會議視為「提醒」覺得感謝時，女性員工對公司的「門禁」覺得不以為然。很快的，女性員工也知道該次臨時會議的原因。數天後某日，受訪者 D-3 的同事 Doris 在與筆者談論此事時，突然說：「你們男人是在天堂，可以到處玩樂」、

她們認為「我不年輕了」，希望與單身男性的交往是能以婚姻為前提的，因此，可能的對象應該如同Becker（1973, 1974）或Bourdieu（1984）所說，擁有若干可以「匹配」的外在條件，是可以提升（或至少維持）社會地位的。但是這個看似寬鬆的選擇方式卻面臨著相當的困難。當事人生活周遭中的單身臺灣男性，若非已婚或有固定伴侶，就是經常涉足聲色場所而不考慮認真交往；而年齡相仿的大陸男性通常都已經結婚，即使未婚，幾乎都是工作上的中低階員工，缺乏交往的意願。因此，雖然移居滿足了受訪者工作上「更上一層樓」的想像，但是情感失落使她們即使「房子都買了」，還是缺乏在當地有「安身立命」的感受。

此處要特別說明的是，影響受訪者與當地男性交往的，並非兩者之間的「族群差異」，而是如同Bourdieu（1984）所說，是小資階層對中下階層的排斥，是一種階層位置上的差異。雖然大部分的受訪者都排斥當地男性，但在2004-2005年時，仍然有S-11、S-13與D-3三位受訪者與當地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男性通婚或交往。<sup>26</sup>這些受訪者一方面表示排斥當地男性，另一方面也表示聽過類似S-11、S-13或D-3的例子，並且「有機會也會願意試試」，這顯示影響她們與當地男性的交往意願時，「想像的階層差距」的確可能構成一個障礙。除非事先已經得知對方的階層位置，她們對當地單身男性都是抱持警戒，在「臺灣男生太花，大陸男生不是太糟，就是沒機會認識」的情況下，形成了「庭院深深深幾許」的現象。

這種「庭院深深」的失落情緒，在過去研究中很少被討論。當

---

「我已經半年沒有性生活了」、「公司居然連這些事情都要管」。Doris對「門禁事件」的反應，讓筆者突然意識到單身臺籍女性似乎對異性交友存在著程度不一的焦慮，也發現當地流傳著不少類似「A女性搶了B女性的男友」或「C女性早上六點從D男性房間出來」的八卦傳聞。當時筆者無法確認傳聞的真實性，但是隨著相識時間拉長，發現當年傳聞都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傳聞中的當事人，都是有一定工作能力與基礎，卻仍然單身的臺籍女性。

26 S-11的配偶是在英國攻讀碩士時的同學；S-13的配偶是一位「文革的時候家裡還可以有個人」的北京望族後代；D-3的前男友則是南方某知名高校的副教授。這些都表示她們交往的對象，都在當地社會有一定的階層位置。



「南向北」的單身女性傾向透過與當地男性通婚而在當地定居，本文發現「北向南」的單身女性卻是因為階層因素排斥與當地男性交往，希望選擇同為「北向南」的單身男性交往，卻發現適合的單身男性若非身旁已有固定伴侶，就是必須面臨當地女性的競爭，相當程度因為情感的失落而不確定是否應該繼續在當地定居。為什麼階層差距有這麼大的影響？階層差距又代表什麼意義？下一小節將進一步說明。

## （二）無緣的「腳踏車羅曼史」：6 位較年輕的受訪者

當筆者在 2004-2005 年接觸這組「從小職員變成機要秘書」的受訪者時，她們都是 20 餘歲，偶而抱怨工作 / 課業繁重沒機會遇到好男人，卻也互相調侃周遭的追求者都是「爛桃花」，不是早就花名在外的臺灣男性，就是看不上眼的當地人。我們藉由受訪者 D-19 的反應，來說明她們對當地男性的態度。

我們約在廣州天河的中森名菜（日本料理店）碰面邊吃邊聊。我問她，「妳有跟這邊人約會過嗎？妳這麼可愛的，這邊應該有很多男生想追妳吧……」她說，「沒有啦……哎唷，是有一個男生，他問我要不要坐他的腳踏車。他要騎腳踏車帶我出去玩。我不要坐他的腳踏車……」午餐之後，我們在餐廳門口分開，我看她蹦蹦跳跳的攔一輛計程車離開。

（田野日誌 14/11/04）

如同前述，大部分的受訪者是工作於臺資企業的中高階幹部，薪資都比大陸籍員工高出許多。這種收入上的差異不但帶來了購買力上的差異，而且間接促成了消費模式的差異。受訪者出入的交通工具幾乎都仰賴公司（或親友）的專車接送，或是搭乘有固定合作關係的私家車，而非當地人經常搭乘的「摩的」<sup>27</sup>、公交車（公共汽車）或出租車（計程車）；消費場所也偏向於西式 / 日式 / 臺式餐廳、明亮開



放的百貨公司或大賣場，而非當地人經常出入的路邊小吃、大排檔或市集。每當週末來臨，受訪者容易將搭乘交通車到深圳羅湖商場（或上海市中心）逛街、享用豐富的中餐（或下午茶）、打保齡球（或高爾夫球、沐足），然後在晚上搭乘特定交通工具返回住所，當作辛苦工作後的休閒活動。

然而，對她們的大陸籍男性同事而言，搭乘交通車到市區之後，在當地市集購買日用品、在狹小巷弄中的路邊攤用餐、然後在傍晚搭公交車或「摩的」回到住所，才是常見的休閒生活。因此，雖然受訪者 D-19 希望在中國大陸尋找到適合的異性伴侶，並不令人驚訝的發現她拒絕與當地男性發展一段可能的「腳踏車羅曼史」。這顯示受訪者與當地一般男性的階層差距，不僅是經濟能力的差距，更是 Vebelen（[1899] 1994）所說消費模式的差距，使得臺灣女性與周遭當地男性在生活形式與休閒活動上有著不小的差異，降低了兩者交往的可能。

在另一次的會面當中，D-19 的好友 Peggy 也一起共進晚餐，Peggy 說道：「你一定不相信我來這邊五六年都沒有交男朋友，就是沒有啊」。筆者正用「妳們這些女人，看不起人家騎腳踏車啦」來調侃 D-19 與 Peggy，並繼續問說：「妳們覺得到底是經濟能力的問題，還是文化思維上的差距」。Peggy 回答：「不能這樣分，我覺得是一起的。就像沒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就不可能坐在這邊吃牛排，就不可能知道該怎麼用刀叉，更不可能知道要怎麼點餐才比較好吃」。在接下來的討論當中，D-19 與 Peggy 都表示，這並不只是經濟能力上帶來消費模式的差距，更是文化層次上生活品味與談吐思維的差距。

對受訪者而言，「牛排問題」顯現的不僅是她們與當地男性在經濟能力上有所差距，更是顯示在需要若干經濟能力才能支撐的消費模式上，以及在必須經由特定的消費模式才能逐漸培養的品味與實踐

---

27 「摩的」（一般發音 Mo Di）是一種以摩托車來攬客，並且向乘客收取費用的運輸工具。價格比同路程的公交車高，卻又比一般的計程車低，是當時東莞與上海郊區常見的交通工具。

上，都有著相當差距。如果只看某個時間點，會以為只是 Bourdieu (1984) 「社會空間」當中，小資階層藉由特定的品味與消費，將與自己不合的行為者排除在交往圈外的現象。但是，當筆者撰寫本文時，筆者與受訪者已經認識超過五年，透過不斷的往返聯繫，筆者不僅瞭解她們移居後的生活，也對移居前的背景有著一定程度的認識。筆者發現受訪者所謂「跟當地人不一樣」的「高文化」消費模式（例如：欣賞歌劇或音樂會，或到有名的西餐廳用餐），並不是在移居前就熟悉，而是移居後逐漸養成，甚至再成為新身份地位的象徵。

對這些在臺灣只是「小職員 / 小老闆」的受訪者而言，是不太可能經常出入這些需要一定經濟能力才能支撐的「高文化」消費場所，但是，到了大陸成為「機要秘書 / 經理」時，卻有了多餘的經濟能力來嘗試這些消費模式，再逐漸模仿學習，有時只是為了區別自己與當地人不同，而刻意表現出來。也就是說，受訪者所說她們與當地一般男性「消費模式的差距」及「品味與實踐的差距」，相當一部份並非移居前就已經具備，而是移居後逐漸學習培養而來。<sup>28</sup> 某些程度更像是 Bourdieu (1984) 所說，是小資階層刻意學習上層社會的品味，希望藉此內化而提升地位，甚至刻意避免原來的品味模式，將尚未習得上層社會品味的行為者貶為低階的他者，並非自己真的熟悉且內化了這些「高文化」的品味。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社會階層如何影響個人的消費習慣與品味模式，並且成為社會關係的基礎，更是看到受訪者不但模仿學習特定的消費或休閒活動，並且藉此標示自己的社會地位，然後將不熟悉這些消費模式的人（通常是當地人），都視為「低階的他者」，排除在自己的社交圈之外。

但是，這些差距在某些時候也如同 Bourdieu (1984) 所說，是生

28 舉例而言，即使高爾夫球已經相當普遍，但是如同馬術一樣仍被視為是貴族活動。在臺灣並不熟悉高爾夫球的小職員，到了東莞後因為成了機要秘書而有機會經常接觸，即使並非公務需要，也會在週末與假日一同相約「去打高爾夫吧」，形成一個只有臺灣人參與的「高爾夫球社」。

活品味與慣習的真實差異。對受訪者而言，假日白天到市區的星巴克喝杯咖啡、晚上在西餐廳用餐、夜晚在酒吧小酌或狂歡，不但是消費或休閒行為，更是生活品味的表現，這些移居後的消費模式，不但是生活調劑，也逐漸內化成為有某種感知氣息的慣習，然後在不同的場域中實踐。受訪者不但有意識地模仿與內化新的消費習慣，並且選擇適當的場合實踐，也會根據當地人在這些場合的實踐，來推敲對方的品味與內在慣習，進而判斷對方的階層位置，作為是否應該進一步交往的判斷基礎。當有些當地臺灣男性告訴筆者「手提 LV 的包包，邊走邊啃甘蔗的女生」的笑話，女性受訪者也告訴筆者類似「穿著汗衫短褲開賓士」、「穿西裝卻蹲在路邊」的笑話，來說明自己與當地人的差距，並不只是經濟能力與消費行為的差距，更是生活品味與感知氣息的差距。

這類的笑話很殘忍，反映了受訪者對階層差異的看法。筆者無意附和受訪者的看法，也無從考察這些笑話的真實性，但是，每當這類笑話出現時，一定還有其他人在旁提供類似的例子以「補充說明」，甚至是直接告訴筆者「你說的那一種，各方面都有一定水準的，在臺灣是基本配備不難找到；在這邊卻是高階配備，很難遇到」，來說明即使是遇到了有一樣經濟能力的當地人，也可能會發現這個當地人在某些品味與慣習上，與自己有意想不到的落差。從這類笑話廣為流傳的程度，以及「基本配備 / 高階配備」的說法，顯示對受訪者而言，她們之所以不願意與當地男性交往，不但是經濟面向的差距，也是文化面向的差距；不僅是消費模式的差距，更是生活品味的差距；不僅是外在實踐的差距，更是內在感知氣息的差距。這些差距不僅是約會時如何「吃牛排、看電影、喝咖啡」的差距，更是生活當中的衣著外貌、談話內容、排隊點餐、討論新聞時事，甚至是舉手投足肢體語言的差距。這些看似細微不重要的現象，卻提醒了受訪者她們與當地男性的差距，因此，除非特殊情況，她們對於當地男性都是抱持排斥的態度。

### (三) 代小結：跨越時空的比較

從前述的討論中得知，受訪者普遍都將當地社會視為一個低階落後的環境，作為自己與當地保持距離的理由，「排斥當地男性」正是這個思維下的重要表徵。但是，筆者也發現她們的「階層位置」概念，除了來自於日常生活當中「臺灣人（通常是指自己與熟識親友）與當地人（通常是指自己生活周遭的當地同事）在當地社會的相互比較」，也來自「原生地與現居地在兩岸之間的相互比較」。筆者更進一步的發現，在受訪者心中兩岸之間的相互比較，是以臺灣主要城市（通常是臺北）來與現居地（東莞或上海）比較，作為「階層位置」與「進步/落後」的論證基礎，除非是刻意討論，通常忽略兩地內部的差異，也忽略臺灣人內部差異的事實，作為自己「比較高階」而與大陸人保持距離的理由。<sup>29</sup>

也就是說，受訪者對自己在當地社會位階的認定，類似於 Colic-Peisker (2008) 所述「移居者母國與地主國在國際上的相對位階，加上移居者在當地社會所屬團體的位階」，但是進一步精緻為「臺灣（臺北）與東莞 / 上海在兩岸之間的相對位階，加上臺灣社群在東莞 / 上海的位階」，得到「自己比當地人高階」的結論。根據這個結論，受訪者不僅自己與當地人保持距離，更會給予新進者（例如：當時的筆者）一系列的生活建議。在此，筆者無意細談這些建議的內容，但是想指出這些建議說明了階層差距，不僅影響著她們的移居經驗，並且被認可成為常規，約束她們的生活。

這個發現引發了兩個問題。第一、由於受訪者的認定方式相當程度是受到臺灣（臺北）與現居住地（東莞 / 上海）在兩岸之間的相對

29 在此，筆者可特別提出受訪者「忽略內部差異」的現象。舉例來說，受訪者大多都知道所謂的「當地人」其實分成「當地戶籍人口」與「當地非戶籍人口」，前者擁有穩定的收入，享受有一定的生活品質與社會地位，後者多為來自外省市的農民工，生活在社會底層，但是受訪者普遍忽視前者的存在，將後者視為「當地人」的代稱，進而符合「當地人是比較低階」的認知。

比較，當東莞與上海的城市發展與一般居民的素質有所差異時，應該可以發現東莞與上海兩地同類型的受訪者，她們對當地社會的態度是有所差異的。第二、隨著中國崛起，東莞 / 上海在兩岸之間的位階也逐漸上升，應該會發現受訪者對自己階層位置的認定也發生了改變，進而影響到她們對當地社會的態度。如果這個空間與時間的差異確實存在，受訪者對當地社會的態度，特別是對當地男性的看法，是否又有不同？

不論是新聞媒體或相關研究都顯示，雖然上海的基礎建設與生活水準與臺灣（臺北）有一段差距，但是卻比東莞來得更現代化與舒適。<sup>30</sup> 不少受訪者自己或親友更是經常往來在臺灣 / 上海、臺灣 / 東莞，或是上海 / 東莞之間，這些非正式的資訊都使受訪者在心中有一個「先進位階排序表」，在 2004-2005 年依序為臺北、上海、東莞。在這個排序表當中，臺北是個雖然領先，但是政治不安令人憂慮；上海是個雖落後於臺灣（臺北），但是「有上升潛力」的城市；東莞則被認為是一個「只適合賺錢」，不宜居住的地方。在這個情況下，如果將同一時間，東莞 / 上海兩地同類型的受訪者相比，上海的受訪者比東莞的受訪者較少強調自己與當地人之間的差距，對當地男性也持著較為開放態度。

例如，上海的 Lotus（受訪者 S-5 同事，背景與東莞 D-11 好友 Peggy 相似）也曾經表示與東莞「牛排事件」的 Peggy 基於相同原因，不願意與當地男性交往，但是偶而也會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表示「去新天地坐坐，看看能不能遇到 CEO」當作自己的週末娛樂。對 Lotus 而言，上海的基礎建設的確比臺北略遜一籌，但是五光十色的外灘與浦東商廈，加上淮海西路上的酒吧與招待所，帶給她某種程度西化的想像空間。對於在臺灣只是小職員，到了上海成為核心幕僚的 Lotus 來

---

30 筆者刻意不引述國際上對東亞城市間的評比，是因為受訪者心目中的評比順序，是來自於生活當中的觀察與體會，與所謂的「標準化」評比並無關連，雖然兩者的結果相距不遠。

說，在臺灣不一定有機會感受到的想像空間，卻在上海體驗到了，因此有時也認為如果遇到適合的當地男性，也不排除發展出一段戀情，即使可能不會長久。

而這種情況在 2004-2005 年的東莞幾乎未曾聽聞。對當時的受訪者而言，東莞 / 廣州的基礎建設落後臺北太多。雖然有著不少臺灣人開的「上島咖啡」、「藍鳥西餐廳」或小酒吧，但是除了麥當勞與肯德基之外，「真正的」西式餐飲並不多。當東莞東城區有了第一家星巴克，酒吧街開始吸引人潮，廣州天河城的購物中心開始營業，珠江邊的白天鵝賓館開始提供下午茶套餐時，這些「新產品」的確吸引不同的受訪者相約前往消費。然而，東莞的受訪者感受到的並不是如同上海 Lotus 所說「看看能不能遇到 CEO」的好奇與探險，而是在消費過程中「先經歷混亂的交通」，慶幸「終於找到一個像樣地方」的「朝聖」經驗。反而使得東莞受訪者更確立了自己與當地社會的差距，更相信對當地男性的隔離態度是正確的。

但是，如果進行同一城市不同時期（2004-2005 年與 2008-2009 年）的比較，更容易發現外部環境變化所造成的影響。在 2008 年中國主辦奧運時，雖然地點不在東莞與上海，而是千里之外的北京，但當時的臺灣社會正在為了總統大選而互相攻擊，相較之下，受訪者普遍有一種「中國崛起、臺灣衰退」的感受（即使這個崛起的中國仍有很多問題需要處理，而這個衰退的臺灣仍有許多值得讚賞之處），連帶影響了現居地（東莞 / 上海）在兩岸城市之間相對位階的感受。

當上海與廣州為了籌辦 2010 年世博會與亞運會，大力提升市區基礎建設與服務品質，引進西式經營管理的服務業時，也對受訪者帶來不小的影響。在 2004-2005 年「交通很糟糕」的上海，到 2008-2009 年卻是「地鐵路線比台北還多」的上海；在 2004-2005 年「只有一家星巴克」的廣州，到 2008-2009 年已經成了「全市有 21 家，你說哪一家」的廣州；在 2004-2005 年在東莞說「我們約在家樂福」，不用細說，因為「全東莞只有一家」，到 2008-2009 年已經成了「難怪我找



不到你，原來你在這一家」的東莞。這些看似「很不科學」的比較，卻從受訪者口中清楚感受到，她們認為當地社會正在快速地改善，自己的競爭優勢逐漸下降，因此，每日兢兢業業工作為的不再是「兩倍的薪水加上來回機票」，而是「不要被砍掉就好」。

筆者並不否認也許這是生命軌跡影響了受訪者的態度，讓 2008-2009 年的受訪者都比五年前的自己對當地社會呈現出更大的接受度。但是，當不同的受訪者都有方向一致的改變時，更無法否認這是外部環境改變造成的影響。例如，在 2004-2005 年經常批評「大陸人沒水準，我不會在這邊買房子，也不會讓我女兒在這邊讀大學」的 Olivia (D-22 的配偶)，到 2008-2009 年已經在東莞市區購置兩戶不動產，並且希望女兒能夠進入廣州某知名大學就讀；在 2004-2005 年表示因為「臺灣沒工作只好來這邊，兩三年就要回去」的 Lotus (D-5 的同事)，歷經與臺灣男友的分分合合，最後到 2008-2009 年男友辭掉台北的工作來上海；在 2004-2005 年「牛排事件」的 Peggy 依然單身，但也不再那麼排斥與當地男性，因為到 2008-2009 年時她妹妹正與一位當地男性交往；在 2004-2005 年時「門禁事件」延伸出的傳聞女主角 Doris，到 2008-2009 年已與當地男性結婚定居。整體而言，雖然 2008-2009 年的受訪者依舊抱怨當地男性「沒水準」，但是不再像五年前那麼強烈，也開始表示「其實有的也不一樣，只是要注意找」。<sup>31</sup> 這些改變都顯示隨著中國崛起，東莞 / 上海 / 臺北在兩地之間的相對位階也發生了變化，臺灣人社群在東莞 / 上海的相對位階也有了改變，這些改變使得受訪者以更開放的態度，來處理自己與當地社會的關係。

31 筆者在修改本文時，正巧剛發生臺灣女明星徐熙媛與大陸富二代汪小菲閃電結婚的消息。在 2004 年曾經表示「我不要坐他的腳踏車」的 D-19，也在 2010 年轉赴上海。她在 MSN 當中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表示，要筆者介紹男友，也表示不在那麼排斥當地男性，只要「優質的就好」。雖然 D-19 一時之間也說不清什麼叫做「優質」，但她與其他受訪者的轉變，說明時空環境的改變影響了相對的階層位置，進一步調整了對當地男性的看法。



## 伍、結論

如同本文一開始所說，傳統的移民研究集中在「南向北」低技術勞工人口的流動，研究重點多半從移居者與當地社會之間的族群差異，或源自於族群差異的文化差異，來解釋他們在當地的生活適應或障礙。即使發現移居者與當地社會之間有階層差異，也認為背後的族群差異才是關鍵因素，因此都忽略了從階層差異來討論移居生活的影響。這種對階層差異的忽視，一直到近年「南向北」的流動者不一定是低技術的勞工，以及「北向南」人口流動的研究出現後，才逐漸發生改變。然而，既有的研究既是跨階層，又都是跨族群的研究，很難確定階層因素有多少的影響力。有限的「北向南」人口流動研究，又都是以男性或已婚女性為對象，以單身女性為主題的討論極為有限。

本文的對象，是華人社會當中的人口流動，又是從想像中發展程度較高的臺灣（臺北）進入感覺上起步較晚的中國大陸沿海城市（東莞 / 上海）。當「族群」的差異被降低之後，移居者在當地社會的階層位置又與傳統研究不同，正是居於優勢位置時，剛好提供了一個好機會來討論階層差異對於移居生活可能帶來的影響，並且以單身臺籍女性對當地男性的態度為例說明。

在經驗層次上，本研究發現，雖然受訪者在移居前，大多只是臺灣社會一般認定的小職員或小企業主，然而在移居後，都被提升到相對優勢的階層位置，成為機要秘書或專業經理人。此一位置上的「升級」，會促使受訪者刻意模仿或展現若干消費行為、生活品味與感知氣息，用以區別自己與當地人的不同。當受訪者遇到身份不明確的「他者」時，受訪者便以「他者」是否具備相似的消費行為、生活品味與感知氣息，當作是否進一步互動的標準。這種判斷方式更具體顯現在受訪者的擇偶標準上，除非有其他方式能事先得知訊息，否則都先入為主地認定所接觸的當地人都屬於「低階的他者」，而只將與當

地人的互動維持在禮貌友善的表面層次上。

本研究也發現，雖然移居者在當地社會的階層位置與自身職務的提升有關，但是更受到「原居地（臺灣）」與「現居地（東莞/上海）」在兩岸之間的相互比較所影響。在 2004-2005 年，臺北的發展大幅領先東莞，部分領先上海時，發現東莞的受訪者在當地也最缺乏幸福感與歸屬感，最不願意與當地男性有所互動。在 2008-2009 年，東莞與上海的發展逐漸接近臺北，甚至部分超越臺北時，發現兩地的受訪者與當地男性互動的意願也有所改變，雖然改變的幅度仍然有限。這些變化顯示，移居者本身的情況，以及原居地 / 現居地的相對比較，共同影響移居者在當地社會的階層位置，進一步影響她們的移居經驗。這種「優勢移民」的現象，一方面反映出階層位置對移居生活的影響，補充既有「移民研究」欠缺的地方，另一方面也回答了既有「中國大陸臺商研究」中，為什麼移居者不願意在當地「安身立命」的疑問。

在理論層次上，本研究得到兩個結果。第一、由於原生國的社會結構或移居者本身的能力有限，透過世界體系往更低階的國家流動，在新國家佔據一定的優勢位置，成為中低階白領向上流動的機會。第二、此一流動模式下的移居者，由於在新國家佔據了一定的優勢位置，除非情境改變，不太願意與當地社會產生密切的互動。這兩項發現，打破了傳統「階層研究」的政治或地理疆界，將「跨國人口流動」與「階層流動」結合，形成一個跨國版的分析。

在這個跨國版的分析當中，行為者與過去的「勞工移民」不同，都有一定知識技術或資源，他們行動的參照點不一定是以本國人為對象，而相當可能是與跨國的他者交互比較，作為自己行動的基礎。然而，筆者並不認為行為者的跨國交互比較是可以無限延伸。行為者的原生國與新國家在遷移的制度安排上是否提供一定程度的便利？相關國家在語言文化上是否有一定的親近性？行為者本身的人格特質，以及知識技術與資源的充裕程度為何？這些都增強（或降低）移居者在

進行跨國交互比較的可能。無論如何，這些發現都引導我們未來思考將國際移民研究與階層研究結合的可能。

在未來的研究展望上，我們應該重新檢視移居者在新環境的適應或障礙，有哪些是出於族群差異的影響，又有哪些是出於階層差異的影響？或是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除了應該有更多的研究，探討從先進國家進入臺灣的外國人，以及從臺灣移往後進國家的本國人，討論他們的移居經驗。也應該有更大規模的研究，比較同族群但不同階層位置移居者的移居經驗（例如：從泰國到臺灣的工程師與外勞），或比較不同族群但階層位置相同移居者的移居經驗（例如：從印尼到臺灣的印尼勞工與華人勞工），才能避免過去將國際移民研究與階層研究二分的現象。

## 謝誌

感謝論文寫作與審查過程中，多位學術界前輩、論文審查人與編輯部對本文的批評與建議。當然，文章中如有任何的錯誤或可能的爭議，都是由本人完全承擔。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 小宮有紀子（2008）臺灣婚姻移民之語言資源：階級、性別與種族差異。「2008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12月13-14日。
- 王宏仁（2009）性別化的草根跨國社區：以臺越關係為例。見王宏仁、郭佩宜主編，*流轉跨界：臺灣的跨國、跨國的臺灣*，頁163-192。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伊慶春、熊瑞梅（1994）擇偶過程之網路與婚姻關係：對介紹人、婚姻配對，和婚姻滿意度之分析。見伊慶春主編，*臺灣民眾的社會意向：社會科學分析*，頁135-177。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牟淑芬（2001）大陸台商子女就學模式之研究：以中小學為例。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平（2009a）從居住空間看臺灣人對中國大陸當地的認同。*臺灣政治學刊*，13(2): 57-112。
- 林平（2009b）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的外省臺灣人為例。*東亞研究*，40(2): 99-140。
- 林平（2009c）庭院深深深幾許。*新社會*，6: 45-49。
- 林平（2010）身在家鄉為異客。見張茂桂主編，*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頁301-330。臺北：群學。
- 林志慎（2002）外來動力的「制度創新」：「東莞台商協會」成立「台商學校」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莊好、魏炯翔（2003）融入大上海：台商低調策略。上海：復旦大

- 學。
- 姜蘭虹、黃禮強（2009）日久他鄉是故鄉：加拿大臺裔移民的心聲。中國地理學會會刊，42: 25-42。
- 耿曙（2002）『資訊人』抑或『臺灣人』？大上海地區高科技臺商的國家認同。「2002年第二屆政治與資訊研討會」論文，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與研究所，4月11-12日。
- 耿曙、林瑞華（2009）「階級」「省籍」或「政黨」？臺灣人當地融入狀況之比較。「2009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論文，臺北：東吳大學，11月28-29日。
- 夏曉鵬（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北：唐山。
- 曾熾芬（2006）誰可以打開國界的門？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臺灣社會研究季刊，61: 73-107。
- 楊國斌（2009）社會階層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楊靜利、李大正、陳寬政（2006）臺灣傳統婚配空間的變化與婚姻行為之變遷。人口學刊，33: 1-32。
- 劉玉照（2005）移民化及其反動：上海農民工與大陸台商反移民化傾向的比較分析。探索與爭鳴，7: 22-25。
- 劉云剛、譚宇文、周雯婷（2010）廣州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動與生活空間。地理學報，65: 1173-1186。
- 劉勝冀（2002）臺灣學生在中國。高雄：復文書局。
- 蔡淑玲（1994）臺灣之婚姻配對模式。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 335-371。
- 鄧建邦（2009a）持續地回家：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的移居生活。臺灣社會學，18: 139-179。
- 鄧建邦（2009b）跨社會流動下中國大陸台商的認同。見王宏仁、郭佩宜主編，流轉跨界：跨國的臺灣、臺灣的跨國，頁133-160。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藍佩嘉 (2005) 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練與種族化。臺灣社會學刊，34: 1-57。

龔宜君 (2005) 出路：臺商在東南亞的社會形構。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英文部分

Becker, G. 1973.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y* 81: 813-846.

Becker, G. 1974.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I."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y* 82: 11-26.

Berry, J. 1992.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in A New Socie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30:69-85.

Berry, J. 2004. "Fundamental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in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Pp. 166-184 in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Training*, edited by D. Landis and M. Bennett. London: Sages.

Borjas, G. 1999. *Heaven's Door: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and Routledge & Kegan Paul.

Callaway, H. 1987. *Gender, Culture and Empire: European Women in Colonial Nigeria*.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artrell, B. 1984. "Settler Wives in Southern Rhodesia: A Case Study," Pp. 165-185 in *The Incorporated Wife*, edited by H. Callan. London: Croom Helm.

Castles, S and M. Miller. 2003.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Macmillan.

Chiang, L. H. N. 2008. "'Astronaut Families': Transnational Lives of

- Middle-Class Taiwanese Married Women in Canada." *Journal of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9(5): 508-511 (SSCI).
- Clark, I. 1984. "The Negation of Structure: A Note on British Council Wives," Pp. 135-143 in *The Incorporated Wife*, edited by H. Callan. London: Croom Helm.
- Coles, A. and A. Fechter. 2008. "Introduction." Pp. 1-20 in *Gender and Family among Transnational Professionals*, edited by A. Coles and A. Fechter. London: Routledge.
- Colic-Peisker, V. 2008. *Migration, Class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Croll, E. 1981. *The Politics of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as, M. and L. Wanasundera. 2002. *Sri Lankan Migrant Garment Factory Workers : Mauritius and Sultanate of Oman*. Colombo: CENWOR.
- Erickson, R. and J. Goldthorpe. 1993.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vell, A., M. Feldblum, and M. P. Smith. 2006. "The Human Face of Global Mobility: A Research Agenda," Pp. 1-28 in *The Human Face of Global Mobility: International Highly Skilled Migration in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the Asia-Pacific*, edited by M. Peter and A. F. Smith.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Fechter, A. 2007. *Transnational Lives, Expatriates in Indonesia*. Hampshire, UK: Ashgate.
- Florida, R. 2005. *The Flight of the Creative Class, the New Global Competition for Talen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Garcia, A., M. Barahona, C. Castro, and E. Gomariz. 2002. *Costa Rica: Female Labour Migrants and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 George, S. 2005. *When Women Come First: Gender and Class i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Berk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rdon,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zig, C. and D. Hoerder. 2009. *What Is Migration Histo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Kirkwood, D. 1984. "Settler Wives in Southern Rhodesia: A Case Study," Pp. 143-164 in *The Incorporated Wife*, edited by H. Callan. London: Croom Helm.
- Kofman, E., A. Phizacklea, P. Raghuram, and R. Sales. 2000.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urope: Employment, Welfare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Leonard, P. 2010. *Expatriate Identities in Postcolonial Organizations: Working Whiteness*. Aldershot, UK: Ashgate.
- Lu, C. W. and W. S. Yang. 2008. "Introduction," Pp. 15-20 in *Asian Cross-Border Marriage Migration: Demographic Patterns and Social Issues*, edited by W. S. Yang and C. W. Lu.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Marx, K. [1857] 1993. *The Grundrisse: Foundations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Books.
- OECD. 2008. *The Global Competition for Talent: Mobility for the Highly Skilled*. Paris: OECD.
- Park, Y. J. 2008. *A Matter of Honour: Being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Sunnyside, South Africa: Jacana Media.
- Piper, N. and M. Roces. 2003. "Introduction: Marriage and Migration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Pp. 1-22 in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edited by N. Piper and M. Roce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 Portes, A. and R. Rumbaut. 2001. *Legacies: The Story of The Immigrant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Siu, L. C. D. 2005. *Memories of a Future Home: Diasporic Citizenship of Chinese in Panam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limano, A. 2008.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alent Mobility." Pp. 1-20 in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 Types, Causes and Development*, edited by A. Solimano.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robel, M. 1991. *European Women and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Thang, L. L., E. MacLachlan, and M. Goda. 2002. "Expatriates on the Margins: A Study of Japanese Women Working in Singapore." *Geoforum* 33: 539-551.
- Tremayne, S. 1984. "Shell Wives in Limbo," Pp. 120-134 in *The Incorporated Wife*, edited by H. Callan. London: Croom Helm.
- Tseng, Y. F. 2010. "Marriage Migration to East Asia: Current Issues and Propositions in Making Comparisons," Pp. 31-45 in *Asian Cross-Border Marriage Migration: Demographic Patterns and Social Issues*, edited by W. S. Yang and C. W. Lu.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Tu, J. C. 2007. "Cross-Border Marriage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Population and Society* 3: 29-43.
- Tzeng, R. 2010. "Cultural Capital and Cross-Border Career Ladders: Western Professional Migrant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5: 123-143.
- Veblen, T. [1899] 1994.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 Walsh, K. 2008. "Travelling Together? Work, Intimacy, and Home among British Expatriates in Dubai." Pp. 63-84 in *Gender and Family among*

- Transnational Professionals*, edited by A. Coles and A. Fechter. London: Routledge.
- Ward, C. 2004. "Psychological Theories of Culture Contact and Their Implication for Intercultural Training and Interventions." Pp. 185-216 in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Training*, edited by D. Landis and R. Bhaga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Ward, C. and A. Kennedy. 1999. "The Measurement of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 659-677.
- Ward, C., S. Bochner, and A. Furnham. 2001. *The Psychology of Culture Shock*. London: Routledge.
- Weber, M. [1948] 2005. "Introduction: The Man and His work," Pp. 1-46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M. Weber. London: Routledge.
- Wennersten, J. 2008. *Leaving America: The New Expatriate Gener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 Willis, K. and B. Yeoh 2008. "Coming to China Changed My Life: Gender Roles and Relations among Single British Migrants," Pp. 211-232 in *Gender and Family among Transnational Professionals*, edited by A. Coles and A. Fechter. London: Routledge.
- Wimmer, A. and N. C. Schiller. 2002.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beyond: Nation-State Building, 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Global Networks* 2:301-334.
- Yeoh, B. and Khoo L. M. 1998. "Home, Work, and Community: Skill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xpatriate Women i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36:159-186.

# Home Alone, Taiwanese Single Women in Mainland China

Ping Lin\*

## Abstrac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class position is an important but neglected aspect of developing cross-border migration, especially for people moving from more- to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Single professional Taiwanese females in China are one such group of migrants. It is helpful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class on migration when the class gap between the migrants and the host society is obvious but the gap in ethnicity is little.

Most of the supporting information was gathered during informal but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4 single Taiwanese women in Dongguan and Shanghai, supplemented by data from ethnography on interviewees' daily lives in 2004-2005 and 2008-2009. The data indicate that despite these Taiwanese respondents' diverse backgrounds, all respondents had class position higher than most local Chinese. Due to this class gap, respondents were reluctant to mix with the local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dating with Mainland Chinese men, unless these Chinese were definitely from the privileged class. Without the proper social life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s, most respondents felt lonely and reluctant to settle down.

The finding of class influence on immigrants' daily lives has been little explored in the field of migration. It not only explains why respondents were reluctant to integrate with the host society, but also suggests a new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polpl@ccu.edu.tw

direction of research for the fields of migration studies and class stud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lass, migration, integration, single Taiwanese women, mainland Chinese men***

